



国家救赎

傅野 著

国家救赎

傅野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SEA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FUJI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救赎/傅野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334-6046-4

I. ①国… II. ①傅… III. 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4902 号

国家救赎

傅 野 著

-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 出版人 黄 旭
- 发行热线 0591-87115073 83752790
-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 500 米 邮编: 102600)
-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 印 张 10
- 字 数 215 千
- 插 页 3
-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334-6046-4
- 定 价 2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62024258) 联系调换。

与吴思对话（代序）

中国五千年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改革史。

古往今来，无数的改革者在这道路上前仆后继。

且不说中国历史早期那些不自觉的社会变革和后来数以百计的中小型改革，仅是那些影响巨大的改革运动就有十几次。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秦始皇统一后的革故鼎新，气魄大，影响更大，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泽被千秋。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盐铁专卖等举措，影响之深远何止一二千年？王莽改制，本拟挽救社会危机，却以轰轰烈烈始，以身败名裂终。北魏孝文帝改革，既显示出少数民族出身的改革家的卓越风采，又反映出即使帝王带头弃旧纳新也会碰到层层阻力。北宋的“庆历新政”，透露出一家哭还是万家哭的矛盾与隐秘；王安石变法，其是非功过至今众说纷纭。当封建帝国的君臣们骄傲自满、闭关锁国之时，世界风云却在不断变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一次又一次地轰击进来。于是，被动挨打的古老帝国踏上艰难曲折的近代化改革历程，神州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等。

一部中国改革史，既有成功的欢呼，又有失败的惨痛，无论何时何地，改革、变法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旧布新往往需要克服各种阻力，要经过艰苦的斗争，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

但是，究竟怎样改革才能成功，怎样改革会导致失败？

这是人们竭力探求而又不易搞清的大问题。为此，才有了和著名历史学者、媒体人，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的吴思先生的这次对话。

傅野：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们发现，无论是从商鞅到王安石，还是张居正，抑或是戊戌变法，这些改革大多失败了。而伴随着失败而来的改朝换代，最终却成功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国历史上，要创新制度是不行的，推翻却是可以的。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是什么原因呢？

吴思：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成功”或“失败”来评断这些改革的成效。

比如张居正，他在位时推出的“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当时是很受君主的推崇，而张居正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君主的重用，位高权重。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依然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可以说张居正的改革非常成功，我们不能简单的因为改革者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将其改革评价为失败。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等也是如此。

而朝代的更换，可以看作一个暴力集团打天下的过程。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江山取胜的，往往是具有血缘

集团优势的。麻烦的是，血缘集团一旦取得了江山，一代一代向下分封，越往后血缘关系就越松散，而且人也越来越窝囊，因为不是淘汰竞争出来的，而是按照血缘继承下来的。

商鞅变法立了二十等爵位，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是一个暴力激励机制。从一等升到二十等，斩敌一个首级，爵位升一级，分田一百亩，宅基地五亩。到第二十级的时候就是封侯，就是一个小君了。这种制度同时规定，以前所有的封建贵族爵位要往下一代传，必须下一代有战功，否则他就不能继承爵位。

但是，原本封建制度下就是要世袭的，如果说不许、禁止，会遭到多大的反对意见？能不能活着出来得享天年都很成问题。商鞅就是这个结果，被车裂而死。谁挡这条路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吴起，吴起说咱们别一代一代往下传，三代终止行不行？不行，有的已经传到第三代了，这等于夺了人家的爵位，这不就得罪了整个楚国的贵族？所以楚悼王一死，吴起立刻就被追杀，伏在楚悼王尸身上被人用乱箭射成刺猬。

所以，简而言之，封建主义是暴力集团打天下的激励机制，一旦成功了也按照这个来分配财富。但是分配下去也有长期的弊病，一代不如一代，还有一个大弊病，分封的王和侯都有自己的军队，标准的封建制度是上面有一个王，王下面有大批的公，每个公都有自己的军事体系、行政体系、税收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下面再细分。比如说三家分晋，晋侯本来就已经很牛气了，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但是他下面的三个大夫，每个都有自己的行政体系、军事体系和税收体系。三家分晋就是《资治通鉴》第一篇的第一个纪事，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原来的规则体

系改了，周王居然承认了他们，封他们为侯，分三个大夫为侯，整个规则体系就破坏了，进入了暴力竞争的时代。下面小的暴力体系的实力一旦超过上面的暴力体系，就有可能推翻上面的暴力体系。就是说封建体系内部有一个暴力均衡，这个暴力均衡一旦破坏，天下就会很乱。春秋战国就是暴力集团的均衡不断破坏不断重建的结果。

傅野：当代也有不少改革者，但这些改革派官员的结局往往令人惋惜。

如曾是内蒙古卓资县县长的张楚，河北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如今都已被废黜；现山东省省长助理陈光，中共绵阳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湖北社会科学院院长宋亚平，是因当初的基层改革而得到保护性提拔，但历经“险恶”，他们有种疲惫和淡然；而剩余一批如仇和等改革的坚守者们，也依然顶着很多压力，带着“争议”的帽子。

您如何看待这些当代改革者遭遇的命运？这是一种必然吗？

吴思：他们都是改革浪潮中的个案，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个人命运，而归纳出“所有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这个结论。事实上，只要我们找到一个成功的改革者，这个结论就会不攻自破的。

而一个改革者在决定是否进行改革之前，其自身也是经过利害计算的，比如改革的成本、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改革后的收益、自身的名誉等等。

傅野：失败的改革，是否都存在某些共同的原因呢？这是否与改革者必须拥有绝对权力有关？而改革者的身分，对改革是否

成功，是不是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吴思：改革失败的原因，包括很多因素。比如改革的策略、改革的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等等。其中，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当权者对改革的利害考量，如果当权者认为改革是利大于弊，那么改革措施就可能会顺利地实行下去，反之就可能不会顺利地实行。

而成功的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即便改革措施是从下面征集上来的，最终实施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由于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改革主导者始终是官方，未来的改革要继续推进，就需要执政者有大担当。如果中国政权自上而下都勇敢地为国家担当改革的重任，中国未来会有一个非常喜人的变化，我希望这种局面出现。

傅野：您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一文中指出，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关键在于向民间借力。您觉得这种借力应该走哪些具体的途径？

吴思：首先要拓宽基层、民间和弱势群体的表达通道。网络和各种媒体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满足人民群众发出声音的需要。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胡锦涛强调，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以及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媒体管理改革的方向。

近几年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与政治有关的各种媒体，却是越来越成为体现领导意图和下达上级指令的单声道。舆论营造至此，真正想推进党内民主的领导人，恐怕也会产生孤立无援之

感。当然，发表言论必须要有规范，对改革者要给予一定的宽容，多理解，多换位。但规范必须有法，法律必须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其次是放宽对民间组织的限制。一盘散沙固然不能成事，但也难以进行低成本的有效自治，难以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难以抵抗腐败。一旦有事，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容易过激，变本加厉地破坏秩序和稳定。

再次是扩大基层选举。村级选举已经推行十多年，乡镇和县级也该开始试点了。如果进展顺利，可以继续推进。如果进展受挫，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想起来，局部基层的试点无关大局稳定，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比较有限，应该是碎步前进的理想起点。

另外，还有司法，司法怎么摆脱行政的约束，相对地独立于行政等等。

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因此，应该有一个日程表，这样就可以让全国人民团结于一个新的目标之下，在一个新的旗帜之下，同心同德，建立一个新的公民权利社会。

傅野：1840年以降，中国遇到了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一个现象则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当然有体制的原因，但知识分子本身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经过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知识分子已经被迫退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边缘，失去了具有民族特质思想的土壤，远离了传统的政治话语权；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真正突破进入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阵地，从而从外围来真正影响中国

的政治生态。两边都不靠，导致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态建设上面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处境。

吴思：作为知识分子，既要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更应当有建设性。要尽可能从现有体制内部实现和平转型。既要大胆揭露和批判公权的腐败方面，也要善意维护政府善治的权威。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稳步演进，是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为了把改革造成的震动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必须稳妥。

所谓稳妥，就是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所谓激进，就是改革方案脱离现实太远；所谓急切，就是改革的时间表安排得过于紧迫。

中国近百年来吃激进和急切的亏太多了。激进和急切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社会失去控制，处于无政府状态，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混乱、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会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堕入暴民和暴政相互交替的恶性循环。

在当下，知识分子应当更多地担负起启蒙者的角色，而不是破坏者的角色，只有这样，官方和民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建设成一个民主的宪政理想国。

（感谢徐阳协助整理本稿）

向历史深处寻梦（前言）

这是一本酝酿了将近四年的书。

大概是在2006年的11月份，那时候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正在热播一部叫“大国崛起”的12集纪录片。看完后我便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大国崛起》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世界上九个主要国家自十五世纪以来的兴衰史。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中央电视台推出了12集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来解读十五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

十五世纪以来，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各国开始相互认识、了解和竞争。在近现代，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

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1917年提出的一个著名

命题。

1947年1月，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克罗齐的历史学》一文中探求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时，曾对这一命题作了如下阐述：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够复苏，才能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是现时史。注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连贯。

六十多年过去了，朱光潜对克罗齐这一命题的认识，现在仍然深刻地启示着我们。

事实上，央视《大国崛起》的热播，不过是美国政治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1985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次中文影像版的演绎。

一个国家的复兴，不是遗忘自己的历史，然后沉浸在一次次简单粗暴克隆异国模式的集体性狂想中。

英国历史学家威尔士在他的《大国的崛起》中这样论断：世界强国的崛起都有着各自的方式，但它们之间有些东西是相通的，那就是勇敢进取改革的精神，以及这个社会宽容大度的心态。

威尔士的追问和探究，得到了美国华裔学者艾米蔡（美国著名的“虎妈”）的回应。艾米蔡在她的《大国兴亡录》中论证并揭露了一个令人入迷的事实：尽管统治世界的力量各不相同，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它们因为宽容而成功，因狭隘而衰落。

当下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的富强，

将创造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过程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近代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追赶，使我们更需要去探索自己的一条强国富民的宪政之路。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将改革开放的使命，嫁接到自“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的爱国情怀、国际视野背后的历史高度和良苦用心。

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数千年历史进程中那些兴衰的改革之道，应该以什么样的胸怀和态度来看待？我们曾经的汉唐风韵也曾引领过世界潮流，中华文明也曾闪耀于世界之林。中国当下的发展，又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当我带着这些问题，试图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书本中寻找答案时，发现没有一本完整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案例研究。

一切的改革其实都是从案例出发。关于那些久远的改革故事，如零星的烟火消散在历史深处，消失在人们选择性遗忘的记忆里。那些曾经引领时代的先知们，要么躺在地下还饱受争议，要么还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人谩骂。

一个国家的变革史，那些改革者的命运与警示，也应该是一个大国得以崛起的一部分因素吧。

中国式改革启示之一：改革人治化难题依然没有破解

从商鞅到张居正，从吕日周到仇和，好像是个悖论：改革能够得以成功的推动者，都无一例外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

中国几千年的改革史，人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方面，改革的推行，必须需要一定的威权基础，否则在中国强大的惯性思维面前，一切的美好设想只能是纸上谈兵。

但改革者个人一旦沾染上人治的色彩，他也往往难逃悲剧的命运，变法最后的结局也是人亡政息。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规律，那些时代的先知们前仆后继地付出了血的代价。

商鞅被车裂的画面至今还在被历史定格，张居正死后官员们对他争先恐后地弹劾清算，让后来者们心有余悸，仇和的铁腕至今还在被喋喋不休地争论。尽管作为个体，他们有着自身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真正给他们带来伤害的还是人治这一改革者挥之不去的魔咒。

人治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产物，它映衬出的是中国几千年改革政治制度设计的一次次缺席。

中国几千年来集权统治，存在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政治环境中。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处在激烈的巨变中，改朝换代频繁，制度化的建设一直落后于时代，不但没有建设发展，而且一直被破坏。

即使在西方，现代经济学奠基人凯恩斯对此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人生感慨：从长远观点看，我们都已经死去。个人利益是短暂的，制度利益才是长久的。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同样适用的真正上策，不是他们最大限度的权力膨胀，而是确保他们延续最长久受命的制度政策。”

曾经主政昆明的仇和对人治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用人治推动法制，用不民主推动民主。这算不算是对中国现实的一种无奈？

在今后制度还没有完善的相当长时间里，长袖善舞的改革者们如何能够在改革与体制之间、舆论与民众之间游刃有余，这

将是对他们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

坦白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治游戏，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自己在这场关乎生死的游戏当中能够笑到最后。所以我们看到了张居正内心最为脆弱的一面，他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也看到了仇和无可奈何的诘问：为什么人们总是把改革者只分成好人和坏人？

国家的崛起、进步、公平与正义，取决于社会、市场和权力这几种力量的制衡。权力失控，市场微弱，社会空转，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制度化的建设已经迫在眉睫。一旦成熟，这将会是一个国家和改革者双赢的局面。

中国式改革启示之二：改革高潮仍没有到来，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改革需新引擎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研究 21 种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后来又相继消亡的文明后，给出结论：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似乎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许多有识之士不得不思考的一个国家命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流行词，在中央的号召下，地方上的主政者们，无数次举起改革的大旗，整个大地都燃烧起改革的火焰。从早期北方内蒙古卓资县的张楚，到主政南方福建的项南，改革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整个中国。

然而，放眼当下中国，改革的火光已经暗淡。一度活力四射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少有的疲态。整个社会对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少，对改革者的批评争议越来越大，人们对公共政治事务已经没有了热情，整个民族沉浸在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自大中，沉浸在一片大好形势的承平歌舞中。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开始抬头，拒绝创新，拒绝学习，这已成为改革的一大阻力。

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推动改革仍然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

如何让改革者群体辈出？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这将成为执政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批务实创新的改革家，谈国家复兴还为时尚早。

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儒学在中国创新变革中一直是主要的反对力量。儒学越盛行的年代及地方，改革的阻力就越大。

儒家强调的自我修行和自我反省，遮蔽了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历史事实：由于他们自己过于相信道德榜样的力量，他们对任何国家内部变革，都曾表示出不屑一顾的怀疑。

这种敌对，曾经在帝国的历史中反复出现。他们把从儒家分裂出来的务实派改革官员视为儒家的叛徒。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当北宋宰相王安石试图改革时，那些大儒们一个个不由分说地向他举起了屠刀，中国历史上一个个伟大的文化巨匠们，开始沦为改革的杀手。

这些儒生们不相信任何的法律与制度，他们只迷恋于个人内心的修为，他们只信奉孔子所说的，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

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随着信息碎片化时代的来临，人们渐渐迷失了自己。如今儒学再次席卷全国，但一个负面的影响则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人们变革求新的思维发展。

一个封闭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将会被创造力所打败。创造力产生竞争，它使人们总是想竞争，想做得更好。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国家，历史性的机遇稍纵即逝，它只属于那些引领潮流的开创者。

正如汤因比所言，失去了创新活力的国家，终究会被历史淘汰。

中国式改革启示之三：社会对改革者缺乏必要的宽容

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按照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的理论，改革是对现有体制弊端的一次颠覆，是对各阶层和政治势力产权交易的重新界定，肯定将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与围剿。没有任何一次改革是皆大欢喜的，引发冲突与争议肯定不可避免，偶然的失误也在情理之中，这是时代发展的规律。

如果说两千四百多年前商鞅推动新法，人们反对尚可理解，那么今天，当吕日周基本安全着陆（转到省政协工作）之后，曾感叹说，“看看历史上的改革者们，我的遭遇已经算很好了，好歹算是提拔了，这也算是组织对我的一种肯定，我非常感激”，就有些不可理喻了。

甚至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以后，国内的思想界